



# 中华 人民共和国

## 50年

### 回顾与思考

谢忱 编著

下

新华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  
50年  
回顾与思考

谢忱 编著

下

新华出版社

## 束 缚

### “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

1976年10月6日，被称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逮捕。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

在举国欢庆胜利、揭批“四人帮”之际，党内外的许多同志以及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优良传统。可是，这种正当的要求却遇到了严重的阻力。这主要是由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思想准备不够；而且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有功的，以后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从1976年10月以来，继续坚持“左”倾错误方针，阻碍为纠正过去的“左”倾错误所进行的拨乱反正。1976年10月7日到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期间，华国锋即提出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10月26日，华国锋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第一次提出了

“两个凡是”。他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免不说。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首都的其它报纸同日转载，全国其它报纸随即也相继转载。这篇社论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社论针对性极强地表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有名的“两个凡是”。它以当时最具权威的“两报一刊”的社论形式出现，明白无误地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这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和意见。事实上，它与华国锋等此前的思想一脉相承，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们对待人民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的呼声，以至整个安邦治国的态度和方针；它的实质就是把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延续下来。

1977年3月10日到22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并部署了当年的工作。14日，华国锋发表讲话，在谈到当时的思想政治动向时，华国锋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得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其中谈到邓小平同志问题时，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华国锋在讲话中首先肯定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总理的。他认为1976年12月5日中央曾就此问题发过通知，所以，这方面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样，他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在讲话中，华国锋重申了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

绩，三分错误。他两次表示并要求全党，“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说明他思想的主导方面还是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的。

与华国锋等的态度相反，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支持人民群众关于拨乱反正的要求，对为进行这项工作设置障碍的“两个凡是”的方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斗争。

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尽管华国锋在会前打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中不要触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但未能奏效。13日，陈云在发言中指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同时提出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的诡计。王震在发言中说，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与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他们的斗争得到了多数与会人员的赞同，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会后，许多老同志呼吁，要求中央正确地解决“天安门事件”，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华国锋迫于压力，认为，如果邓小平承认“天安门事件”不是革命行动，可以出来工作，但被邓小平拒绝。

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胜利推向前进”。这封信于5月3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党，为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作了准备。它成为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5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两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说过两个“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但是，华国锋继续宣传“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理论和政策。197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它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说成是指导我们斗争的武器。同年7月、8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和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说：“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之后，邓小平又反复讲“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实事求是，要解放思想。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领导职务。这无疑是党和人民对“两个凡是”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与此同时，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呼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

聂荣臻在《红旗》杂志中发表了题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文章，他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一切正确思想，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否则就变成形而上学。”

9月19日，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指出，“我们决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

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说：“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

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老一辈革命家在“两个凡是”和“实事求是”这样的根本问题上进行斗争的同时，还推动着一系列局部和具体问题的拨乱反正。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的进展都不同程度地动摇着“两个凡是”的基础。

1977年8月，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虽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却认为这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报告虽然对“四人帮”的谬论和倒行逆施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但却仍然坚持并且阐发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左”的观点；报告仍然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实践。这些错误虽然只代表了少部分人的观点，但却以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形式昭告党内外，说明在党中央高层占据支配地位的仍然是“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

历史就在这样的徘徊中前进。由于受到“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拨乱反正的工作仅取得一点局部性的进展，大量的冤假错案仍不能平反昭雪。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左”的思想影响下的又一次跃进又束缚了经济发展。历史越来越明确地提醒人们，“两个凡是”束缚着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经济恢复。要想从根本上结束“文化大革命”，必须走出“左”的思维误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后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这篇文章矛头直接指向“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文章阐述了如下主要观点：（1）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3）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4）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检验。文章最后指出：我们要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

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阉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文章发表后，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赞同和拥护。1978年6月2日，邓小平还阐述了《实践论》中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他强调指出，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为冲破“两个凡是”、重新确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在开幕会上继续坚持“左”的错误，希望在不触动“左”的指导思想前提下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因此，他在讲话中没有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没有提指导思想的问题。在会上，广大老同志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老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会议大大突破了华国锋所宣布的讨论经济工作的范围，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党在多年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总结。

会上，华国锋在讲话中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这个方针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责任应由自己承担。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肯定，并代表中央给“天安门事件”平了反。

“两个凡是”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在1978年被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战胜了。

## 人民的心愿

###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的复出成为党内外关注的重要问题。人民呼唤着邓小平，期待着邓小平能再度扭转中国的时局。

然而，邓小平的复出是艰难曲折的。

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当时，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全国各方面的工作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以势如破竹的革命魄力和运筹帷幄的领导才能，很快扭转了时局。在邓小平领导下，在一大批先后恢复领导职务的老同志配合下，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便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了，并且迅速收到显著的效果。

但是，对于邓小平在各个领域所作的整顿，“四人帮”从一开始就进行顽固地阻挠、抗拒，并伺机提出反对。邓小平的这些主张和措施使“四人帮”极为恼火，他们对他施行种种攻击。一个时期里，“还乡团总团长”、“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不管白猫黑猫的走资派”、“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走资派”等等罪名，指向了邓小平。

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的一段时期里，毛泽东对他的工作是支持的。但是，邓小平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整顿，势

必要触及“文革”中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也势必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政策和理论的系统纠正。这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不久，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认为邓小平是在“翻案”。毛泽东愤愤指出：“翻案不得人心。”

1976年4月，对邓小平的批判彻底公开化了。“天安门事件”中，首都和外地来京的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声势浩大，群情激愤，锋芒直指“四人帮”，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但在4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将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激起一片欢腾。经过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谁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谁又是祸国殃民的罪人。人民在呼唤新的春天，人民在召唤邓小平。

然而，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抬出了毛泽东，制造“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受迫害干部的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而平反冤假错案，首先要为邓小平这个最大的冤假错案平反，否则一切平反无从谈起。

许多老干部仗义执言，要求为邓小平平反，恢复其工作。叶剑英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绝大

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但是，叶剑英的意见并没有被接受。

在会上，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起来反击“两个凡是”，郑重地坚决地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陈云在事先准备好的书面讲话中说：“我认为绝大多数同志到天安门去是为了悼念周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慷慨陈词：“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陷害他！”

陈云、王震的发言虽然不让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但却得到许多与会同志的赞同。华国锋有点被感动了，他深知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身经百战的元老在中国的份量和巨大影响力。

在严峻形势的压力下，华国锋采取了打圆场的办法。他讲话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来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

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

关于邓小平问题。华国锋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诬陷打击，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决定继续批邓，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局势。至于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经过五个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会议后，叶剑英继续给华国锋做工作，坚持要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

邓小平的复出，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同时，邓小平还列举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讲话加以分析，来阐释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曾经把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也历来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曾讲过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一部分，就像‘四人帮’那样把知识分子污蔑为‘臭老九’。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是重视知识分子作用的。”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讲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而应当从爱护知识分子出发，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还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

华国锋感到阻挡不住邓小平的复出了。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邓小平指出：“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把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邓小平的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也为他的复出创造了条件。

经过老一辈革命家的反复工作，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邓小平终于出来重新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

1977年7月，在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强调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

重要。”

邓小平的复出，处在粉碎“四人帮”的大好时光里。但这时党内并未完全清除“左”的影响。华国锋并没有认识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反而仍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所以说，1977年、1978年，全党工作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人民呼唤邓小平，历史需要邓小平。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是在“左”倾僵化思想的斗争中完成的。他在恢复工作以前，就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提出挑战，并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强调恢复实事求是的党的优良传统，提倡打破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着重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依靠实事求是。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这次会议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方针。虽然这次全会后，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的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邓小平的复出，顺运了中国亿万人民的心愿，使困境中的中国迎来了又一道新的曙光。

## 历史在这里徘徊

### 中共十一大：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取得初步成效，全党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四项决议：（1）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2）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决议；（3）关于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4）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这些话，对于批判“两个凡是”和拨乱反正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全会巩固和发展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成果，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准备。然而，这次大会并没有完成思想上的清算任务，没有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对党的束缚，致使党的十一大以“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为思想主线，没有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党的指导思想仍停滞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水平上，中国的历史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段徘徊。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510名，代表3500多万名党员。大会期间，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叶剑英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同时，选出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01人，候补中央委员132人。

《政治报告》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结了向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谬论，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恶阴谋，揭露了他们反革命的政治目的，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为标志而彻底结束。

二、继续错误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报告》强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我们要创立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但“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而是要把阶级斗争继续开展下去，消灭阶级敌人，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消灭资本主义残余势力。

三、在干部问题上，强调三个正确对待，即“受过审查的同志，一定要注意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这表明，并没有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表明了“文革”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仍在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中根深蒂固。

四、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艰巨任务。《报告》还指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抓纲治国”的八项任务：（一）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二）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三）一定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四）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五）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事业；（六）一定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七）一定要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八）一定要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同时提出，要使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见大成效。这些，除了其正确的一面外，还使人们看到，当时还未摆脱“左”的思想束缚，仍存在着冒进主义的思想。

五、《报告》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同时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全国委员会。

党的十一大所制定的路线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

积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进行了一定的揭发，着重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大会指出：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加以清算，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

二、重申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大会的政治报告着重强调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意义，要求把揭批“四人帮”的政治斗争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尽快地发展生产，使人民生活不断地有所改善。

三、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大会上强调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就是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和民主集中制